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创建 和展览学术活动

刘 建 业

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在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畔，一座宏伟的建筑落成了，它就是受到国内外重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自1987年7月7日落成到现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历程。五年来在中央及北京市领导部门的关怀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不断发展，已初步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基地，和加强国际交流，增进与国外友好人士联系的桥梁。

民族精神的展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兴建的一座大型博物馆。它座落于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地——卢沟桥畔的宛平古城内。

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缅怀那些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和一切在这场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贡献过力量的英雄志士而兴建的。该馆于1986年7月7日破土动工，198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完成第一期工程。

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兴建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建筑界、文化界、艺术界、军事界许多卓有声望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使它无论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在陈列方式上，都有较高的水平。

该馆占地面积27680平方米，第一期建筑面积为7260平方米，建筑物共两层，总高度19.7米，首层为办公研究、资料

区，二层为对外展出区，由序厅、东西展厅、环廊和半景画厅组成。

从卢沟桥往西，进入古色古香的宛平古城，步行一百余米，就会看到一座牌坊式的建筑物，这就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它背倚宛平城垣，左右与画梁雕栋的宛平城楼相呼应，周围绿树环绕，青草茂茂，环境幽静而肃穆。进入馆区，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宽42米进深39米的花岗岩台阶，台阶平台上屹立着一座4.5米高的巨大铜铸醒狮。它振鬣裂眦，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雄浑气魄。整个纪念馆的外墙面，满饰白色磨光花岗石，上覆灰色无光琉璃瓦，在白墙和灰瓦之间，是一道茶色铝合金采光带，三者结合使纪念馆的外形具有民族风格。由邓小平题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个两米多高的镏金大字，就镶嵌在纪念馆正面宽大的花岗岩门额上。

序厅的正面，有一座长18米、高5.5米、厚1.3米的巨型铸铜浮雕，它以磅礴的气势展示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全民抗战的主题，使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硝烟烽火的战场上，引发观众对抗日先烈、民族英雄产生强烈的敬仰之情。

序厅东西两侧，各有一组宽大的台阶，通向环廊和展厅。台阶迎面的墙上，镶着两幅黑底金字的歌谱，一面是《义勇军进行曲》，一面是《八路军进行曲》。展厅设在东西两翼，净面积1320平方米，高度4.5米。它采取中间柱承重的方式，不设隔墙，显得宽阔、舒展。地面采用浅红色磨光花岗石，顶棚则以轻钢龙骨承托方格状深色光栅，灯光自光栅上部投射下来，增加了庄严、肃穆的感觉。

从环廊沿着曲径，可直通半景画厅。半景画厅是一座宽40米、进深20米、高18.5米的大型自动化展厅。它的主要功能是放置一幅视野为180度的大型油画，这幅油画总长50米，净高15米，展示卢沟桥事变时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景况。在半景画前以实物和模型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当年卢沟桥战场

的景观，与半景画组成了一幅卢沟桥地区的立体图。展厅通过声音控制光线变化及电影放映技术，能使半景画似乎活动起来，参观者坐在宽敞的观众席上，宛若置身于当年卢沟桥抗战的战场，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磅礴气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列方式，也有许多创新，它打破了传统的照片、实物、沙盘加布景箱的老框框，采用了诸如半景画厅这样的立体展陈方式，使参观者如身临其境，增加真实感。在两个展厅内，还设计了东北抗联营地实景厅和日本投降仪式厅等，采用蜡人、大型场地模型等展品，力争给参观者强烈的印象，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效果。

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它浓郁的民族形式，富有气势的建筑规模和现代化的陈列方式，吸引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观众。人们在这里可以回顾抗日战争的光辉历程，重温中华民族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苦难史，学习中华先烈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观众纷纷称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列是民族精神的展现。

抗日战争的辉煌史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览，反映了从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史。展览由基本陈列和短期专题展览两部分组成。基本陈列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它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过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在由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夺取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基本陈列力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但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和海外侨胞的

可歌可泣的斗争活动，而且真实地介绍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活动，对国民党爱国将领抗日的业绩和贡献也做了如实的反映。许多海外归侨和台湾同胞，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家属，都称赞抗日战争纪念馆反映的历史是经得起推敲的。台湾《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组在抗战馆拍摄录像片时说：“从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陈列内容上，可以看出大陆史学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日本一些学者对抗战馆基本陈列的评价是“公允，正确，史料丰富”。

基本陈列中有许多珍贵照片和文物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有些文物已成孤品，更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如卢沟桥事变时中国守军佩戴的钢盔，目前所知仅存一件。美国有一位军品收藏家曾跑了几个国家寻觅这种文物，不得一见，而在抗战纪念馆内他见到了这件展品，终于补充了他资料中的一个空白。再如卢沟桥事变时，日军进攻宛平城时曾使用过的迫击炮弹，有少量发射后没有爆炸，50年后在兴建抗战馆的工地上被发掘出来，陈列于展厅，成为日军侵华的有力罪证。其他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重要代表人物使用过的文具、指挥刀及所撰文稿原件，都是研究抗战史的第一手资料。

基本陈列展出的许多珍贵照片，是研究抗战史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涉及国际友人和其他一些国家抗日活动的照片，对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及反法西斯斗争史都有一定的价值。如第一展厅内有一幅朝鲜义勇军在中国活动的照片，受到了朝鲜学者的极大重视，特地要求征集这件展品。再如展出的一幅“世界各国人民纷纷举行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被英、德、波兰等国家的参观者称为“记载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重要资料”。

展览中介绍的许多统计数字，也是引人注目的。在第二展厅内列出的“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和平民伤亡统计”指出：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为21 685 000余人（不包括东北

四省及台湾），这个数据已为国际学术界所采用。其他如“敌后战场主要战绩统计”、“正面战场歼敌及受降统计”，也被海内外学者广泛用作研究依据，在不少专家的论文里都使用了这些统计成果。

基本陈列尽管较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历史，但由于展厅面积所限，尚不能细致地展示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整个抗战史也只能以“大事不漏、重点突出”的原则给予轮廓性的反映。这就使广大观众感到内容过于浓缩，对有些重大题材不能详尽其始终，如南京大屠杀只用了九幅照片，平型关大捷仅有两幅照片，难以展示事件的全貌。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抗战馆采取了举办各种临时专题展览的方法，用各种专题展览去细致地介绍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这种展览是短期的，每年都要更换新的内容，与基本陈列相配合，进一步宣传抗日战争的历史。

四年多来，抗战馆共推出了七个反映抗战史的专题展览，接待观众200多万人次，使抗战史的研究工作深入人心。这七个展览分别是“九一八事变史料陈列”（通过大量战犯的口供和原始文献资料，展示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山海关失陷时的日本侵华史）、“抗战时期名人题辞手迹展”（以一百余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重要领导人和其他著名人士的题辞，展示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北京地区抗日斗争史迹展”（展示了北京地区抗日斗争的全貌，讴歌了白乙化、包森等十几位著名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吴印咸抗战时期摄影作品展”（选择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先生的近百幅摄影精品，展示战时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东北地区四烈士事迹展”（介绍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四位烈士的抗日事迹）、“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军部革命活动展”（通过介绍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军部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展”（以大量历史文献、照片及实物，揭露了日军七

三一细菌部队利用活人进行试验等一系列罪行）。这些展览的基本内容都力求事实准确，材料清楚，形式生动，尤其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队的有关领导，对抗战馆的专题展览都给予极大关注：李先念、彭真、李鹏、刘澜涛、吕正操等领导人都亲笔为展览题名或题辞，宋平、李锡铭、迟浩田、姬鹏飞，杨成武、肖克、吕正操、朱穆之等同志为展览剪过彩。这一系列展览不但把抗战史推向普及，而且向学术界介绍了不少最新资料和成果，比如“新四军军部革命活动展”以大量事实澄清了过去通行的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成立于南昌的说法，肯定了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成立于武汉。再如“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展”以大量事实说明，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的罪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屠杀了被试验者，而且已经把细菌武器投入了使用，仅仅是没来得及大规模使用罢了。美国学者看后，认为这是一大进展。这样展览就达到了既使普通观众看后受到深刻教育，又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研究信息和最新成果的目的；这对于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和促进抗战史研究，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展览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全国已有近20个省市提出引进抗战馆的展览。几年中抗战馆已向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江苏等省输出四个展览，其中七三一部队罪行展已预约到明年年底，“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军部革命活动展”在南京展出后还将分赴郑州、乌鲁木齐等地展出。

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

杨尚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时的讲话指出：“要用抗日战争这部丰富的历史教材，向广大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抗日战争纪念馆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抗日战争的历史，讴歌抗日英烈的高风亮节，颂扬中

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起到了弘扬民族精神，激励爱国主义感情的作用。

建馆四年多来，已接待观众近300万人次。不少观众是含着热泪离开纪念馆的。一些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来到纪念馆后久久不肯离去。当他们徘徊在序厅里那座题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浮雕前时，常常禁不住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老将军满怀激情地说：“来到抗日战争纪念馆，我才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立起来了，无数先烈的血没有白流，而今天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认真地思索一下，如何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更加繁荣富强。”伟大的抗日战争史，激荡着无数参观者的心。青年学生参观后在留言中写道：“我今天才痛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我将为她生，也将为她义无反顾地去死。”一位在科研领域里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科学家感慨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哪里会有科学家驰骋的天地。”那些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们则在留言簿上挥写：“祖国万岁！”“中华民族浩气常存！”不少自海外专程赶来参观的侨胞在展厅内流连忘返，他们说：“看了展览我们感到扬眉吐气，中国受人宰割欺凌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在抗战馆接待的数以万计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宋哲元、孙连仲、冯治安等人的亲属，有亲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爱国官兵，还有大批专家、学者，形成了一个广泛联系的交流网。不少台湾历史学家殷切地希望与抗战馆互相交换资料，互通信息，共同编写抗战史书刊。这种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目前正在努力争取付诸实践。

为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战争纪念馆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组织各项大型活动，五年来共举行大型活动100余次，诸如党员宣誓大会、新兵入伍大会、重大纪念日座谈会等，这些活动紧密结合抗日战争的主题，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使参加活动者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一位参加过“九一八事变史料展”开幕式的教师几年后说：“我至今还牢牢记得大会的情景，想起了那次大会，就想起了抗战馆，也就觉得应该动员更多的人去参观，让人们了解抗日战争史，了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由于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史的关心，抗战纪念馆的观众越来越多。在整个博物馆界观众量趋于减少的情况下，抗战馆却门庭若市，1991年观众达126万人次，1992年第一季度，观众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现在纪念馆不得不采取预约登记的办法来安排集体观众。

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基地

胡乔木在抗战纪念馆的筹建阶段就指出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在研究抗日战争史上下功夫，应该培养一批年轻的抗战史专家，写出一些有一定理论高度的学术论文，并且广泛收集文献资料，逐渐成为全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遵照这一指示，抗战馆从成立那天起，就把推动学术研究列为全馆的一项重点工作。五年来，抗战馆花了相当精力，一方面培养本馆的青年科研骨干，一方面积极联系国内外专业研究人员，广泛交流情况，沟通信息，交换新的研究成果，发掘新的研究资料。截至1992年一季度，抗战馆已与全国一百多个研究团体建立联系，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术联系网络，为推动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举办学术研讨会

为促进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纪念馆自1988年开始共举办过三次学术研讨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成果一次比一次丰富。学术会的参加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也有部分外国学者，有一定的影响。

胡乔木出席了1988年7月召开的首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

会，并做了重要讲话。曾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王定国，杨国宇（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前空军副政委）等也参加了讨论会。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孙思白、彭明，和王明哲等做了专题发言。胡乔木在会上提出的，“希望尽快地产生一系列跟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相称的，在学术上、政治上、文献资料上有足够份量的学术著作”的倡议，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拥护，成为全国抗战史专家们为之努力的目标。

1989年10月，抗战馆主办了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除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40余名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和前苏联的研究人员。杨成武、朱穆之、姜思毅、白介夫等出席。这次学术会气氛活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学者反映这次学术会不仅是硕果累累，而且发扬了好的学风。通过这次研讨会，许多学者与抗战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经常与抗战馆交流研究成果和信息，使抗战馆逐渐成为一个抗战史研究的联络中心。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是在1990年1月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史。吕正操、肖克、杨成武、李运昌、段苏权等46位曾经领导过北京地区抗日斗争的老干部赶来祝贺，原西霞军区副司令王亢将军抱病参加了三天的讨论，段苏权将军同部分学者进行了座谈。会议对若干史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会者除了在史实上做了大量的交流、磋商外，还对治学方法和开拓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抗战史研究要加强北京地区地域性抗战史的研究。

（二）出版学术著作抢救历史文献

几年来抗日战争纪念馆投入了大量精力，撰写、编辑有关抗日战争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先后出版了几部论文集和资料文献集。抗战馆编辑书目的选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类著作能够体现抗日战争史研

究的最新成果，反映抗战史研究领域里的新动向。抗战馆共出版了两部论文集，第一本是刘大年、郑惠主编的《中日学者对谈录》。这是1987年在日本召开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中日两国的20余名著名学者在学术会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中日学者对谈录》就是这次学术会的成果。全书收入中日两国专家的19篇论文，每篇都是立论高深，资料详实的精辟之作。全书充分体现了会议得出的一致认识，即“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日中两国全面战争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中日学者对谈录》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出版界的巨大反响，在日本被学术界列为名著，在中国则获得社会科学优秀书目奖。论文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经成为目前抗战史研究中的不刊之论。

第二本论文集为《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由杨成武将军题写封面。这是抗战馆第二次学术会的重点论文集，共收录全国学者论文28篇，是自1984年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结晶。此书出版后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2）日本学者重要文集的中译本。抗战纪念馆组织编译了由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诚组织十几位日本专家撰写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全书27万字。它旗帜鲜明地指出：侵略与反侵略是中日战争的根本性质，“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性质是反抗日本侵略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书中肯定了国共两党都对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珍贵历史文献集。抗战馆将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编辑、整理并出版，其中《晋察冀画报影印集》（上下卷），是一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大型资料文献。该书汇集了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出版的《晋察冀画报》、《晋察冀画刊》、《晋察冀画报丛刊》以及《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冀热辽画

报》、《冀中画报》等期刊，经过整理编成上下两卷影印出版，全书共1534页，收录反映当时战斗生活的照片3000余幅，是一部华北党政军民抗日斗争的光辉画史。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很大重视，聂荣臻元帅专门接见了该书的正副主编，对《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座谈会时，刘澜涛、肖克、杨成武、王平、李葆华、孙毅等243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叱咤风云的老将军、老干部出席，热情地祝贺这本文献集的出版，对它的作用和意义做了十分中肯的评价。

（三）搜集抢救活资料，建立声像文献档案

抗日战争的亲历者目前健在的多已年届耄耋，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见证人，掌握着大量活资料（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部抗日斗争史），把这些活资料抢救保存下来，丰富史料，也可以使许多史实得以澄清。抗战馆在近几年来，十分注重这项工作，先后拜访了几十位曾指挥或领导过各地抗日斗争的老干部、老将军，摄下了他们的形象，录下了他们对一些事件的回忆讲话，其中包括聂荣臻元帅、肖克、程子华、杨成武、杨得志、刘澜涛、王平、李葆华等老同志。这些照片、录像带、录音带经过整理后，将会成为珍贵的声像资料，为研究增添新材料。

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馆近几年来注意了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工作，一方面把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实地介绍出去，一方面如实评价苏、美、英等盟国军队及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对正确地研究二战历史，开展国际交流都是有益的。

从1987年到1992年春，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代表团来抗战馆参加交流，抗战馆抓住这些交流机会，将中国人民对二战

的支援和贡献向他们介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少外国学者说：“以前对中国战场的评价过低是不公正的。”南斯拉夫、波兰、孟加拉国的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波兰代表团还邀请抗战馆派代表团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学术会议。

日本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与抗战馆的研究人员进行过学术交流，他们认为抗战馆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博物馆，去年由日本“人骨问题究明会”的十几位专家教授组成访华团，曾拿出一整天的时间来抗战馆对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罪行进行调查了解，抗战馆的研究人员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内幕，获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当我们指出对“七三一”罪行的研究应从以前的“实验室内”转向广阔的亚太战场时，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倡议。目前，日本有三十多个团体，正与抗战馆协商共同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已签定三项意向书。

美国、前苏联、南北朝鲜等国家的学者都已正式提出要和抗战馆联合进行抗战史的研究工作。其中北朝鲜社科院革命史研究所提出与抗战馆建立互访互学关系，南朝鲜国际民间交流协会则多次专程来抗战馆协商共同编写抗战史书籍问题，美国纽约的“日本侵华研究会”明确表示长期与抗战馆合作，并提供了美国牧师马休博士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实况”录像带。

1990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研究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被推举为研究会的常务办事机构。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在第一届理事会上，确定将会长设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此抗战馆又承担起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日常工作。在全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关怀和支持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成了一个宣传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